

## 杜预“周公作凡例”说探微

方 韬

**提 要** 五十凡例是杜预春秋左氏学的核心概念。但是,杜预认为凡例为周公所作的说法受到历代学者的激烈批评。事实上,杜氏将凡例附会周公,与魏晋时期将古书附会周公的风气相关,同时,它也是古文经学发展的必然步骤。魏晋之时,国家礼制建设多以《周礼》为依据,司马氏父子亦好以周公自拟。在这种复古从周的氛围中,杜预以凡例附会周公,有其必然性。

**关键词** 《春秋》 《左传》 “周公作凡例” 杜预

五十凡例是杜预春秋左氏学的核心概念。杜氏《春秋经传集解序》(以下简称《春秋序》)曰:“《经》之条贯,必出于《传》;《传》之义例,总归诸凡。”<sup>①</sup>凡例是《左传》中以“凡”开头的传文。依常理而言,五十凡当为左丘明所作。然而,杜预指出,凡例乃周公所创,丘明据圣人之义为文。《春秋释例·终篇》曰:“诸凡虽是周公旧典,丘明撮其体义,约以为言。”<sup>②</sup>《春秋序》亦云:“其发凡以言例,皆经国之常制,周公之垂法,史书之旧章。”显见,周公拥有凡例的创制权,杜氏言之凿凿。

可是,杜氏此说却备受后学的指责。唐人赵匡《春秋集传纂例》责难道:“杜预云:‘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。’按其《传例》云:‘弑君称君,君无道也;称臣,臣之罪也。’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?又曰:‘大用师曰灭,弗地曰入。’又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?”<sup>③</sup>赵氏在这里无异指斥杜预置周公于不仁不义之地。晚清近代以来,学者们进一步指出,以凡例为周公所制是魏晋以前未有之说。刘师培曰:“汉儒旧说,‘凡’与不‘凡’,无新旧之别,不以五十‘凡’为周公礼经。明经为孔子所作,经文书法,创自孔子也。杜预以下,悉以五十‘凡’为周公旧典,魏、晋以前,未闻斯说。”<sup>④</sup>据此,将凡例与周公相联系,当是杜预的首创。黄侃则认为杜预以凡例属周公,实开近世以六经为周公之旧的先河。《文选平点·春秋左传序》:“近世谓六经乃周公之旧。仲尼则而修之,其谬乃自元凯始,《汉书》本自分明也。”<sup>⑤</sup>由此可见,杜预首创的“周公作凡例”说,是经学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。故而,探讨“周公作凡例”的学术渊源,为澄清这一段经学史提供线索,是很有意义的。

① 杜预:《春秋经传集解》,《四部丛刊初编》,上海:上海书店影印,1989年版。

② 杜预:《春秋释例》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5年版,第661页。

③ 赵匡:《春秋集传纂例》,收入《文渊阁四库全书·经部·春秋类》,第146册,第385页。

④ 刘师培:《春秋左氏传例略》,《刘申叔遗书》,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,第342页。

⑤ 黄侃:《文选评点》,北京:中华书局2006年版,第526页。

要解决周公是否作凡例的问题,我们首先应对周公的“制作”进行考察。

据司马迁《鲁周公世家》所载,周公制礼作乐,并创作《诗》、《书》。1、周公所作《书》有:《牧誓》,《鲁周公世家》:“武王九年,东伐至盟津,周公辅行。十一年,伐纣,至牧野,周公佐武王,作《牧誓》”;《大诰》,《鲁周公世家》:“管、蔡、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。周公乃奉成王命,兴师东伐,作《大诰》”;《多士》、《毋逸》,《鲁周公世家》:“周公归,恐成王壮,治有所淫佚,乃作《多士》,作《毋逸》”;《立政》,《鲁周公世家》:“作《立政》,以便百姓。百姓说。”以上五篇皆见于《今文尚书》。2、周公所作《诗》有:《鸛鸣》,《鲁周公世家》:“东土以集,周公归报成王,乃为诗贻王,命之曰《鸛鸣》”,见于今本《诗经·陈风》;3、周公所制礼有:《周官》,《鲁周公世家》:“成王在丰,天下已安,周之官政未次序,于是周公作《周官》,官别其宜。”<sup>①</sup>从司马迁的时代来看,周公的制作主要在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,与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无涉,自然更难与凡例相关。不仅如此,早在战国时期,儒家大师孟子将周公兼夷狄驱猛兽,与禹平洪水、孔子作《春秋》相提并论,视《春秋》为孔子的大功绩,全然与周公无涉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曰:“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,周公兼夷狄、驱猛兽而百姓宁,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”<sup>②</sup>直至西汉末年,文献中并没有出现周公与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相关联的证据。

但自东汉始,托名周公的著述陡然增多。首先出现了“周公作《周易》”的新说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兴与周公相关,诸家皆无异词。而《周易》历经三圣,为伏羲、文王、孔子相继而成,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本自清晰:“《易》曰:‘宓戏氏仰观象于天,俯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,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。’至于殷、周之际,纣在上位,逆天暴物,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,天人之占可得而效,于是重《易》六爻,作上下篇。孔氏为之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之属十篇。故曰《易》道深矣,人更三圣,世历三古。”<sup>③</sup>而东汉的许多古文经学者将《周易》的著作权部分归诸周公。昭公二年《左传正义》云:“郑众、贾逵、虞翻、陆绩之徒,以《易》有‘箕子之明夷’、‘东邻杀牛’,皆以为《易》之爻辞周公所作。”<sup>④</sup>对此,吴承仕《经典释文叙录疏证》曰:“然则周公作爻辞盖郑大夫、贾侍中旧说也。”<sup>⑤</sup>郑兴、贾逵是东汉前期振兴古文经学的大师,可见,周公作《周易》本是古文家之说。汉末陆绩(187—219)更将周公作《周易》与孔子作《春秋》并举,张大其词。其《述玄》曰:“雄受气纯和,韬真含道,通敏叡达,钩深致远,建立《玄经》,与圣人同趣,虽周公繇大《易》,孔子修《春秋》,不能是过。”<sup>⑥</sup>又《开元占经》一、二引陆绩《浑天仪说》:“周公叙次六十四卦,两两相承,反覆成象,以法天行,周而复始,昼夜之义。”<sup>⑦</sup>据此可知,周公作《周易》的新说自东汉前期滥觞,到汉末

① 司马迁:《史记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2年版,第1515—1522页。

② 焦循:《孟子正义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7年版,第459页。

③ 班固:《汉书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1704页。

④ 孔颖达:《左传正义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2029页。

⑤ 吴承仕:《经典释文叙录疏证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15页。

⑥ 严可均校辑:《全三国文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58年版,第1423页。

⑦ 严可均校辑:《全三国文》,第1422页。

魏初有愈演愈烈之势。

其次,学者们还将多种重要典籍的著作权托名于周公。曹魏时期,张揖将《尔雅》归在周公名下。其《进广雅叙》曰:“臣闻昔在周公,纘述唐虞,宗翼文武,克定四海,勤相成王,践阼理政,日昃不食,坐而待旦,德化宣流,越裳侏贡,嘉禾贯桑。六年制礼,以导天下,著《尔雅》一篇,以释其意义。”<sup>①</sup>张揖史无传记,唐颜师古《汉书叙例》说:“字稚让,清河人,一云河间人,太和中为博士。”<sup>②</sup>那么,其上《广雅》亦当在魏明帝世前后。此外,刘徽曾注《九章算术》,他认为《九章》亦周公之作。刘徽《九章算术注序》云:“暨于黄帝,神而化之,引而伸之,于是建历纪,协律吕,用稽道原,然后两仪四象,精微之气,可得而效焉。记称隶首作数,其详未之闻也。案,周公制礼而有九数,九数之流,则《九章》是矣。”<sup>③</sup>刘氏注书当于曹魏末年,《晋书·律历志》:“魏陈留王景元四年(263年),刘徽注《九章·商功》。”<sup>④</sup>显而易见,魏晋时期将古书作者附会周公的现象更加普遍。

随着周公作《周易》的新说出现,五经中只有《春秋》为孔子独创。而魏晋时期将古书附会周公的风气,又为杜预发明“周公制凡例”说提供了现实的土壤。清代以来的学者多批评杜预的附会之说,但不做具体历史的考察,无疑是有所欠缺的。

## 二

《春秋》为古代史官的产物,这是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阐述的六艺王官学思想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:“古之王者世有史官。君举必书,所以慎言行,昭法式也。左史记言,右史记事,事为《春秋》,言为《尚书》,帝王靡不同之。周室既微,载籍残缺,仲尼思存前圣之业,乃称曰:‘夏礼吾能言之,杞不足征也;殷礼吾能言之,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,足则吾能征之矣。’以鲁周公之国,礼文备物,史官有法,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,据行事,仍人道,因兴以立功,就败以成罚,假日月以定历数,借朝聘以正礼乐。”<sup>⑤</sup>班固以为,孔子所以取鲁国史记作《春秋》,关键在于鲁国是周公故国,“礼文备物,史官有法”。春秋之世,王室已卑,礼崩乐坏。只有鲁国完好保留着周公所传的礼乐典章,而且其史官记事也严格遵循着周公史法。可见,《艺文志》虽未明确表述孔子修《春秋》是继周公而起,但却通过孔子取材鲁史记,把《春秋》与周公联系起来。而且,《艺文志》本承刘歆《七略》,那么,周公与《春秋》相关当是古文家的旧说。

然而,司马迁的说法与班固不同。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曰:“是以孔子明王道,干七十馀君,莫能用,故西观周室,论史记旧闻,兴於鲁而次《春秋》,上记隐,下至哀之获麟,约其辞文,去其烦重,以制义法,王道备,人事浹。”<sup>⑥</sup>司马迁认为,孔子西去周王室观史记而成《春秋》。稍晚于《史记》的《颜氏春秋》也说:“孔子将修《春秋》,与左丘明乘如周,观书于周史,归而修《春秋》之经,丘明为之传,共为表里。”<sup>⑦</sup>颜氏所论孔子如周观书与司马

① 严可均校辑:《全三国文》,第1276页。

② 班固:《汉书》,第4页。

③ 严可均校辑:《全三国文》,第1352页。

④ 房玄龄等:《晋书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74年版,第492页。

⑤ 班固:《汉书》,第1715页。

⑥ 司马迁:《史记》,第509页。

⑦ 孔颖达:《左传正义》所引沈文阿文,第1705页。

迁同调。颜氏所传为《公羊春秋》,司马迁又曾问学于董仲舒,二人皆习今文经学。据此可知,西汉的今文家普遍认为孔子西去周王室观史记而后作《春秋》,并不以鲁国之史为主。近人章太炎肯定司马迁的说法,其《国学讲演录·经学说略》曰:“然鲁之《春秋》,局于一国,其于列国之事,或赴告不全,甚或有所隐讳,不能得其实事;既鲁史载笔,亦未必无误。如此则其纪载未必可信,不信则无从褒贬,不足传之后世。以故,孔子不得不观书于周史也。既窥百国之书,贯穿考核,然后能笔削一经尔。”<sup>①</sup>尽管司马迁、章太炎之说可能更接近孔子作《春秋》的实情,然而,班固改《史记》的“观书于周”为“观书于鲁”,显然有他的用意。班固所习为古文经学,他这样说有抬高《左传》,贬斥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的目的:“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,以失其真,故论本事而作传,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《春秋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,有威权势力,其事实皆形于传,是以隐其书而不宣,所以免时难也。及末世口说流行,故有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《邹》、《夹》之《传》。”<sup>②</sup>班固又自注曰:“左丘明,鲁太史。”以左丘明为鲁太史,当是班固的新论,其说不仅与司马迁有异,甚至不同于其父班彪。班彪《史记论》曰:“故《孟子》曰:‘楚之《梲机》,晋之《乘》,鲁之《春秋》,其事一也。’定、哀之间,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,作《左氏传》三十篇,又撰异同,号曰《国语》,二十篇,由是《乘》《梲机》之事遂暗,而《左氏》《国语》独章。”<sup>③</sup>班彪指出左丘明是鲁君子,而班固则更其为鲁太史。至此,周公是鲁国的始祖,孔子所据为鲁周公故国的史记,而为《春秋》作传的左丘明是鲁太史,这样,就有一条以鲁国为中心的线索把三人联系起来了。

杜预在班固的基础上对周公、孔子与《春秋》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发挥,其《春秋序》曰:“周德既衰,官失其守,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,赴告策书、诸所记注,多违旧章。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,考其真伪,而志其典礼。上以遵周公之遗制,下以明将来之法。其教之所存,文之所害,则刊而正之,以示劝戒。其余则皆即用旧史;史有文质,辞有详略,不必改也。故《传》曰:‘其善志’,又曰:‘非圣人孰能修之?’盖周公之志,仲尼从而明之。”杜预认为东周之时,史官已经不能遵循周公之教,史法多失。孔子根据鲁国的旧史,秉承周公的遗制修成《春秋》。这样,杜预就明确交代出周公与孔子间的承继关系。

然以《左传》而言,杜预还需论证周公与凡例的关系。《左传》昭公二年:“晋侯使韩宣子来聘,且告为政而来见,礼也。观书於大史氏,见《易象》与《鲁春秋》曰:‘周礼尽在鲁矣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,与周之所以王也。’”杜预注云:“《鲁春秋》,史记之策书。《春秋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,故曰‘周礼尽在鲁矣’。”<sup>④</sup>杜氏认为,《春秋》是依据周公之典来叙事的,而此与班固所云“鲁周公之国,礼文备物,史官有法”的思想一致。《左传》隐公七年:“凡诸侯同盟,于是称名,故薨则赴以名,告终、嗣也,以继好息民,谓之礼经。”杜预于此注曰:“此言凡例,乃周公所制礼经也。”<sup>⑤</sup>杜氏据此认为,“凡例”是周公所作“礼经”。而礼经即周公之典,亦即《春秋》应遵从周公凡例来叙事。对于“凡例”即周公之典这一说法,杜预在《春秋释例》中多次强调。如卷四《书次例》:“凡师一宿为舍,再宿为信,过信为

① 章太炎:《国学讲演录》,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,第94页。

② 班固:《汉书》,第1715页。

③ 范晔:《后汉书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65年版,第1325页。

④ 杜预:《春秋经传集解》,第1209页。

⑤ 杜预:《春秋经传集解》,第41页。

次。此周公之典,以详录师出入、行止、迟速,因为之名也。”<sup>①</sup>这里,杜预明确指出五十凡中的“书次例”为周公之典。而具体到《左传》,凡例又是左丘明据周公旧典加以记录整理的,故卷十五《春秋释例·终篇》曰:“诸凡虽是周公之旧典,邱明撮其体义约以为言。”<sup>②</sup>

至此,杜预将古文经学中固有的周公与《春秋》的关系,进一步引申到《左传》凡例上来,从而确定了凡例在解释《春秋》中的核心地位。正如《春秋序》所言:“其发凡以言例,皆经国之常制,周公之垂法,史书之旧章;仲尼从而修之,以成一经之通体。”肯定凡例为周公所作,孔子笔削《春秋》的意义就被大大淡化,而孔氏所作的工作不过是照录旧史并稍加修订,所谓“其教之所存,文之所害,则刊而正之,以示劝戒。其余则皆即用旧史;史有文质,辞有详略,不必改也”。对此,黄侃一针见血地指出杜预此说的实质:“即用旧史,自来无此说,惟如此而后可尽排先师之说。”<sup>③</sup>周公居于孔子之上,使古文经《左传》能够凌驾今文经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二传而独享《春秋》的解释权。对此,作为今文经学家的皮锡瑞叹息道:“及杜预之说出,乃有周公之《春秋》,有孔子之《春秋》。周公之凡例多于孔子之变例,若此则周公之功大而孔子之功小,以故唐时之学校,尊周公为先圣,孔子为先师。”<sup>④</sup>由此显见,杜预“周公作凡例”说对后世经学影响之大。

蒙文通指出:“古文至杜预、王弼,始全离今文而自树一帜也。”<sup>⑤</sup>尤其是杜预阐明了周公对《春秋》的贡献,并构建出《左氏春秋》学“周公——孔子——左丘明”的承继关系。这样,六经皆源自周公,标志着古文经学的完全确立。

### 三

杜预认为“凡例”是周公所作礼经,实与《周礼》密切相关。由于《周礼》是周公致太平的书,故而倍受古文经学家的重视。汉末卢植就要求将《周礼》与《左传》、《毛诗》一起列为博士学官。尤为重要的是,《周礼》是古文经学的核心。汉末,郑玄已以《周礼》为纲,折衷礼制,贯穿群经。清人廖平更是指出两汉今古文的分野在于其所阐明的礼制,今文经学以《王制》为中心,古文经学以《周礼》为基础。今以此论验诸《左传》杜预注,可谓若合符节。杜预在《春秋释例·终篇》中明确表示:“邱明之传,有称《周礼》以正常者,诸称凡以发例是也。”<sup>⑥</sup>那么,凡例当是据周礼所发。杜预推崇《周礼》,而对后出的《礼记》多所质疑。杜氏批评:“礼记又是后儒所集”,特别指出《礼记·月令》出自《吕氏春秋》,而非古典。《士功例》:“《周礼》:祭宗庙以四仲,盖言其下限也。《月令》之书出自吕不韦,其意也欲为秦制,非古典也。”<sup>⑦</sup>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礼记音义》‘月令’也说道:“此是《吕氏春秋》十二纪之首,后人删合为此记。”<sup>⑧</sup>沿用杜预说。

因此,杜预在注释《左传》时,非常重视用《周礼》来解释《左传》中的礼制。据笔者统

① 杜预:《春秋释例》,第84页。

② 杜预:《春秋释例》,第661页。

③ 黄侃:《文选评点》,第525页。

④ 皮锡瑞:《经学通论·春秋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54年版,第3页。

⑤ 蒙文通:《经学抉原》,上海: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,第76页。

⑥ 杜预:《春秋释例》,第661页。

⑦ 杜预:《春秋释例》,第59页。

⑧ 黄焯:《经典释例彙校》,北京:中华书局2006年版,第377页。

计,杜预注中标明出处的书证共55条。其中《周礼》就占17条,其他最多的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加起来才13条。试举二例。《左传》庄公二十八年:“凡邑,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,无曰邑。邑曰筑,都曰城。”杜预注:“《周礼》:四县为都,四井为邑。”又僖公二十四年传:“遂奉大叔以狄师攻王。王御士将御之。”杜预注:“《周礼》:‘王之御士十二人。’”杜注引用《周礼》原文而未注出处者更多。桓九年传:“冬,曹大夫来朝。宾之以上卿,礼也。”杜预注:“诸侯之嫡子,未誓於天子而摄其君,则以皮帛继子、男,故宾之以上卿,各当其国之上卿”。孔颖达《左传正义》曰:“‘继子、男’以上,皆《周礼·典命》文也。”<sup>①</sup>又,《左传》隐公五年:“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”,杜预注:“八音,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也。”《左传正义》曰:“八音为‘金、石、土、革、丝、木、匏、竹’,《周礼·大师》文也。”<sup>②</sup>

此外,杜预部分采用《周礼》的也不在少数。《左传》僖公十年:“及七舆大夫。”注:“侯伯七命,副车七乘。”《左传正义》曰:“《周礼·大行人》云:‘侯伯七命,贰车七乘。贰即副也。每车一大夫主之,谓之七舆大夫。’”<sup>③</sup>注中杜预除了将“贰”易为“副”,全本于《周礼》原文。又,《左传》僖公二十二年:“丁丑,楚子入享于郑,九献。”杜注:“用上公之礼,九献酒而礼毕。”《左传正义》曰:“《周礼·大行人》云:‘上公九献,侯伯七献,子、男五献。’”<sup>④</sup>此处杜氏取《周礼》“上公九献”之义而叙述稍详。如此大量地引用《周礼》来注解《左传》,不仅因为《左传》中的礼制与《周礼》有诸多相通之处,而且根源于杜预所处社会的现实需要。

魏晋时期的制度建设多本诸《周礼》。魏文帝曹丕初建曹魏政权,宗庙祭祀之礼多依从《周礼》。《宋书·礼志》:“魏文帝虽受禅于汉,而以夏数为得天,故黄初元年诏曰:‘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,宜如汉制。宗庙所服,一如《周礼》。’”<sup>⑤</sup>当其之时,魏朝群臣议礼多以《周礼》为断,还引起来当时大儒王肃的不满。《宋书·礼志》:“散骑常侍王肃议曰:‘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,今说者据《周官》单文为经国大体,惧其局而不知弘也……’卫臻、缪袭、左延年等咸同肃议。奏可。”<sup>⑥</sup>王肃由于是当时司马氏的亲信,所以群臣才附议,由此足见《周礼》影响之大。司马炎即位后,仍然沿袭魏制,其用《周礼》可知。《宋书·礼志》:“晋武帝泰始二年九月,群公奏:‘今大晋继三皇之踪,踵舜、禹之迹,应天从民,受禅有魏,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,皆如有虞遵唐故事,于义为弘。’”<sup>⑦</sup>

值得关注的是,晋朝的新建制度,许多都据《周礼》而来。《宋书·百官志》:“晋初依《周礼》,备置三公。三公之职,太师居首,景帝名师,故置太宰以代之。太宰,盖古之太师也。殷纣之时,箕子为太师。周武王时,太公为太师。周成王时,周公为太师;周公薨,毕公代之。汉西京初不置,平帝始复置太师官,而孔光居焉。汉东京又废。献帝初,董卓为太师,卓诛又废。魏世不置。晋既因太师而置太宰,以安平王孚居焉。”<sup>⑧</sup>据此可知,太师

① 孔颖达:《左传正义》,第1755页。

② 孔颖达:《左传正义》,第1728页。

③ 孔颖达:《左传正义》,第1802页。

④ 孔颖达:《左传正义》,第1814页。

⑤ 沈约:《宋书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74年版,第328页。

⑥ 沈约:《宋书》,第537页。

⑦ 沈约:《宋书》,第333页。

⑧ 沈约:《宋书》,第1217页。

原为曹魏所未有,司马氏据《周礼》而新设。

汉代京师设有太学,曹魏延用之。晋武帝司马炎又设国子学,其隶属于太学。《宋书·百官志》:“国子祭酒一人,国子博士一人,国子助教十人……国子,周旧名,周有师氏之职,即今国子祭酒也。晋初复置国子学,以教生徒,而隶属太学焉。”<sup>①</sup>据《周礼》:“师氏,掌以微诏王,以三德教国子:一曰至德,以为道本;二曰敏德,以为行本;三曰孝德,以知逆恶。”可知,国子学之设亦本诸《周礼》。晋室礼制建设有复古从周的风气,恐与司马氏为河内儒家世族,司马懿父子三人相继为曹魏辅宰,自比周公旦相关。魏明帝青龙四年,司马懿献所获白鹿,明帝以周公褒誉司马懿。《晋书·宣帝纪》:“四年,获白鹿,献之。天子曰:‘昔周公旦辅成王,有素雉之贡。今君受陕西之任,有白鹿之献,岂非忠诚协符,千载同契,俾乂邦家,以永厥休邪!’”<sup>②</sup>明帝大修宫殿,司马懿上疏劝谏,颇以周公自居。《晋书·宣帝纪》:“是时大修宫室,加之以军旅,百姓饥弊。帝将即戎,乃谏曰:‘昔周公营洛邑,萧何造未央,今宫室未备,臣之责也。’”<sup>③</sup>司马师废掉齐王曹芳,立高贵乡公。傀儡皇帝下诏嘉奖司马师,亦以周公旦喻之。《晋书·景帝纪》:“大将军世载明德,应期作辅……伊挚之保义殷邦,公旦之绥宁周室,蔑以尚焉。”<sup>④</sup>

杜预是司马氏集团的重要人物。杜氏娶司马昭之妹高陆公主为妻,与司马氏关系非比寻常。应该指出的是,杜预虽以《左传》名家,但从根本上说,他是个政治人物。如果把注《左传》放进他整个生平中考察,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观察他的创作动机和目的。杜预曾参与灭蜀平吴两次大战役,为司马氏统一全国立下赫赫战功。他又为晋朝制订律令,并为之注解,后世号称“杜律”。上《二元乾度历》,为晋修订历法。在泰始年间,力排众议,主皇太子“谅闇”短丧,对晋初礼制建设有重大影响。总的来说,杜预的这些作为意在为司马氏缔造国家的基本制度。而他的《左传》注正是这样一个背景下的产物。经学作为带有强烈意识形态性质的学问,与政治密不可分。我们认为,杜预以“周公”附诸《左传》凡例,还与维护司马氏政权有关。

综上,杜预发明“周公作凡例”的新说,绝非空穴来风,而是有着深层的学术、政治原因。从学术角度看,周公拥有凡例的创制权,与魏晋时期以古书附会周公的风气一致;而且,它是古文经学发展的重要环节。从政治角度看,凡例与《周礼》相关,而《周礼》与西晋的制度建设关系紧密;更加之,司马氏父子喜欢以周公自比,这也可能是促使凡例附诸周公的现实原因。杜预以周公作凡例立说,显然有维护司马氏政权的用意。

(作者通讯地址:方韬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100875)

(责任编辑 晓 文)

① 沈约:《宋书》,第1228页。

② 房玄龄等:《晋书》,第9页。

③ 房玄龄等:《晋书》,第10页。

④ 房玄龄等:《晋书》,第28页。